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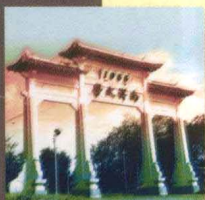
南洋人文丛书

理想与现实

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

1956-1964

丘淑玲 著



南洋大学历史研究

1



南洋人文丛书



南洋大学历史研究
1

理想与现实

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

1956-1964

丘淑玲 著

理想与现实

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

1956-1964

阅 览



八方文化创作室

- | | |
|-----------|--|
| 作 者 | 丘淑玲 |
| 企划编辑 | 潘国驹 |
| 责任编辑 | 王淑娟 姚忠在 |
| 丛书标志篆刻 | 何梅田 |
| 封面 / 内页设计 | 何美娇 |
| 排 版 | 李丽芳 |
| 出 版 |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12 Nanyang Drive, Singapore 637721
www.ntu.edu.sg/CCLC/Research
八方文化创作室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
| 发 行 |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
| 联 络 | 65-64665775 支线416
chpub@wspc.com |
| 印 刷 |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S) Pte Ltd |
| 初 版 | 2006年3月 |
| 国际书号 | 981-4139-52-1 |
| 版权所有 |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洋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	丁邦新	香港科技大学
	王德威	美国哈佛大学
	王赓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袁行霈	中国北京大学

主编	李元瑾	
副主编	柯思仁	郭淑云

南洋人文丛书·南洋大学历史研究

主编	李元瑾
----	-----

“南洋人文丛书”总序

“南洋人文丛书”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第二套丛书，第一套即继续出版中的“南大语言文化丛书”。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于2003年年终归入大学新成立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与该院旗舰系——中文系分工，在研究与教学两方面相辅相成。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是在大学热烈回顾半世纪校史和积极朝向综合性学府目标迈进的时刻诞生。这有两层意义：第一，大学溯源固本，发扬“南大精神”，塑造学府独特气质与风格；第二，大学在理工学科基础上，加强“人文教育”，提供全方位的教学课程，开拓多元化的研究领域。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旗下各系和研究中心，紧随大学的理想与目标前行。

经历半世纪，大学的发展从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学院，再到南洋理工大学，校名一直保留“南洋”二字。“南洋”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南洋大学创办时，创办人陈六使虽多次表达发扬中华文化的决心，但时时不忘大学的本土特色，于是定名“南洋”，并将发展本土文化纳入办校方针内。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基本上继承这一宗旨，重视中华文化在中国内外的的发展，更关注它在本土 / 本地区的调适与演变，以及如何与世界文化碰撞与接轨。本丛书“南洋”二字，取自校名，既具历史意涵，也凸出内容特色。

近年来，大学确立综合性学府的发展方针，加强非理工色彩，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更被誉为“大学的灵魂”（大学徐冠林校长之语）。学院除了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人才，也为全校学生开课，“使他们能了解人文课题并欣赏文化，不会成为狭窄的、只会解决技术问题的大学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南大创校50年庆典上的

演辞)。在这功利主义挂帅、语言苍白、文学贫瘠、历史浅薄、哲学架空、文化断层的年代，大学之于人文教育与人文研究，自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本丛书“人文”二字，取自院名，既反映学术使命，也传达出版旨趣。

“南洋人文丛书”从2006年起陆续出版，分成系列和单本两种形式，每本书都经过内外部评审，以确保作品质量。我们要感谢各书主编和撰写者的辛劳，也希望更多专家学者加入丛书队伍，共同为学术耕耘和人文建设而努力。

李元瑾

2005年12月

“南洋大学历史研究”缘起

随着1953年“南洋大学”校名的选定、“南洋大学创校宣言”的发布，以及“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法人地位的确立，海外华人第一所中文大学在新加坡云南园诞生了。这所民办学府经历了50、60和70年代的颠簸岁月，即于1980年匆匆告别历史，结束新马华人教育史上富有传奇色彩与悲剧特性的章节。

这一章节如何建构，学术界涉猎不多。从历史研究的立场来看，现当代历史当然可以探索、值得书写，如果及时获得历史直接参与者的口述资料和各种重要文献资料，研究成果自然丰硕。但是，如果研究的课题处处触碰社会忌讳或轻易即跨进政治禁区，则动辄得咎、寸步难行。总之，对某些历史课题进行研究，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远近，优势和缺点同时存在。无论如何，两者都值得尝试，长短将可互补。

就因为近距离的压力和限制，学者们对新马现当代某些课题的探讨，或不愿着手，或自我设限。有关南洋大学历史（以下简称为南大史）的研究，更是少人问津。70年代后，新加坡本地大学出现了几篇跟南洋大学有关的荣誉学位毕业论文，但没有公开发表；另外，一些研究新加坡教育、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也出现有关南洋大学的论述，不过为数不多。至于有计划、有系统、有深度的南大史研究，更是付诸阙如。这种情况持续到1990年代末期，终于有了变化。

90年代初期发生了两件事，跟南洋大学息息相关，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第一件事是1991年7月南洋理工学院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当时政府肯定南大精神，呼吁南洋大学校友协助新大学的发

展，建议将南大校友名册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迁入南洋理工大学，带来了新旧南大历史衔接的契机。第二件事是1992年6月在多伦多举行的第一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名作家、前南大讲师韩素音在会上呼吁复办南大，引发了校友们母校凤凰再生的梦想。此后“复办南大”、“续办南大”和“南大复名”之呼声不绝于耳。于是，整个90年代至21世纪前面5年，有关南洋大学的种种课题，受到政府、大学、校友、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南大史的研究与书写，就在这过程中逐渐酝酿。

90年代末，南大校友和华社针对恢复南大牌坊旧貌、保存南大历史建筑物、收集南大史料、书写南大历史，以及在南洋理工大学开办南大史课程发出呼吁，并得到回应。1998年，政府批准将南大三景（南大牌坊、南大建校纪念碑和前行政楼）列为国家历史古迹。同年，时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博士就校友呼吁南大史的研究与教学向报界说，大学早已有进行南大史研究的构想，如今愿意尝试；时任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周清海教授则表示欢迎有志者到中心进行南大史研究。这之后，在媒体、校友和大学的互动下，南大史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担负起开展南大史研究计划的责任。

我们愿意承担南大史研究计划，因为这项研究无论从新马研究、东南亚研究、东南亚与中英两国的关系研究来看，或从海外华人教育、移民、社会、文化等研究来看，或从填补新马历史空白，以及为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如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化学等提供有价值的微观研究来看，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身处云南园学府的研究机构，对于早期校史的探究，更是义不容辞。而近年来，发扬“南大精神”呼声处处响彻云霄，倘若不知南大历史，也就谈不上发扬南大精神了。

南大史研究计划必须靠团队的力量来完成。2000年6月，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通过报界，呼吁有关人士支持和协助南大史口述计划，

同时鼓励有志者申请研究生奖学金钻研南大史。2001年，南大史研究计划的核心队伍诞生，由主持人、三名博士生和一名硕士生组成。研究生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从南大创办人、南大学生会、南大与政府的关系和南大左倾思想四个课题着手展开研究。他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也进行口述历史的工作。2003年，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我们邀请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的学者加入，组成第一个工作坊，并在2004年6月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办的“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各自的研究心得。会后不久，第二个工作坊成立，由主持人、研究生、新聘研究员和校外学者组成，大家分工合作，从不同角度，撰写南大历史。

南大史研究需要学者们的学识、道德和勇气。南洋大学匆匆20余载，多少政治忌讳，多少感情纠葛！仅仅是书写的动机就引起一些人的质疑，他们猜测这项研究背后是否有人挥动指挥棒，怀疑研究者会找什么样的资料、能说多少真话？在史料搜集的过程中是一波三折，许多相关人士不愿参与口述历史计划，或者受访时遇到敏感问题则避而不谈；许多官方和民间机构的重要档案无缘翻阅，即使是名义上已公开的资料，借阅时也困难重重。至于历史的谱写更不易为了，好些人心中都有一部南大史，他们有个人的经历、情感和看法，对南大史的建构有各自的想象，于是不知不觉地要求研究者去印证他们心中的结论。南大史研究团队的成员时时互相督促和勉励，要求对历史和学术负责，尽量做到符合科学与客观的准则。队员们常常提醒自己：如果刻意为哪一个对象树碑表功，就会影响选材和书写的客观性，削弱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或许，我们的研究会因为资料的匮乏而有不足之处，需要时日来补充，但是必须尽量避免以情治史或因为压力而随意改变历史。

“南洋大学历史研究”编入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出版的“南洋人文丛书”之中，自成一个系列，这意味着南大史研究成果经过修订与评审之后陆续出版。此一系列以专书、论文集、史料编析和校史

编撰等不同类别呈现。专书方面包括研究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论文集则收录学者们围绕共同主题而撰写的单篇论文；史料编析是将重要课题的资料加以选择、编辑和论析；校史编撰则由多位学者分工合作书写南大历史，并以中、英两种语文面世。

南大史研究计划有所进展，我们要感谢愿意提供口述资料和文献资料的人士，也要感谢应邀加入队伍的学者。这是一块值得专家学者们有计划、有规模地去开拓和耕耘的园地。可喜的是，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也于2001年成立南洋大学历史编撰工委，积极展开南大史研究，并陆续出版了史料选编和论集等，彼岸的热忱令人感动和鼓舞。我们热切盼望今后会有更多地方、更多不同学科训练的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课题，进行有关研究与论述；相信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和长期不懈的积累，南洋大学往昔的面貌将会越来越清晰。

李元瑾

2005年12月

李元瑾序： 激流中浮沉的南大学生会

20世纪的50、60年代是全球秩序转化的重要时期。经历了二次大战乱局，世界原有的势力版图被打破重组，国际冷战局面形成，新的观念和思潮也随之涌现并急速蔓延。各种意识形态的崛起、政治意识的醒觉，激活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意识和反殖情绪，点燃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这些地区的人民，急于摆脱殖民统治的桎梏，争取独立自主；在热切追求新事物、新知识的同时，坚决地维护民族文化。

属于第三世界的新马社会，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踏入50年代，新马人民一面准备送走殖民地统治者，一面着手打造自己的家园。此时此刻，知识分子与年轻一代肩负的使命比任何时期都来得沉重。在以华人移民占大多数的新加坡社会，华文教育知识分子所背负的责任又比受英文教育者更为艰巨。他们除了承担时代交托给他们的任务，也必须继续坚守民族教育和传统文化。然而，战后新兴国家在建构过程中，民族教育与文化的定位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要塑造怎样的国家，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构想有一定的距离。前者期盼完全摆脱殖民的操控和“遗害”，把国家尊严建立在民族文化的振兴上；后者则着眼于国际、区域和本土现实的考量，包括对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顾虑，加上领导层教育背景的影响，坚持采用英语至上的政策。

就在这历史转折时刻，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在新加坡诞生了。当大局尚未稳定时，南洋大学的创办加深了华人社会与政府在民族教育与文化问题上的矛盾。在许多华人的眼中，南大的存在有助于建国，理应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在当权者看来，南大的出现妨碍了国民意识的形塑，既然未能阻止则必须设法改造。于是，双方因为南大的华文色彩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敏感问题，陷入了长期的对抗状态。作为华社的最高知识分子，南大学生在这纷争过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

《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是从学生的角度探索南大历史的一本重要著作。丘淑玲追溯南大学生会的诞生背景、成长脉络，探讨学生会的组织形态、领导层，剖析学生会的出版、言论，以及发生在各个阶段的活动、学潮和政治斗争行为。她将南大学生会放在所属的大时代和所处的特殊环境里进行考察，展示它与时空相应相克的互动关系，不仅相当全面地呈现学生会的纵横状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加坡社会的动荡、华文教育的艰苦和南洋大学的困境；而南大学生会作为第三世界大学生组织的一份子，它的出现与发展，折射了时代的变化，具有其典型意义。

从大时代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丘书提到的“全部”角度，南大学生会的诞生与演变，都不是孤立的现象。二战后亚非拉各地大学生在共同的大背景下纷纷组织学生会，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理念与关怀，包括反殖建国、维护民族教育文化和关注国际局势等。于是，南大学生会走出校园参与建国事业，继承传统维护民族教育，以及踏入国际跟其他大学学生组织接轨。从个别环境的角度，也就是丘书提到的“局部”角度，南大学生会有它的特殊性。它所担负的民族教育——华文教育的使命，因为本地区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纠结而变得步履蹒跚，比诸第三世界其他大学学生会所承载的同样任务，更为沉重。同时，也因为多了这层负担，它的角色又比邻近马来亚大学学生会所扮演的更为吃力。

华文教育与共产主义的牵扯，使南洋大学历史一掀开序幕就被投以不信任的眼光。英国殖民地政府因为担心南大被共产主义渗透而不希望它顺利办成，后来又为了防止南大受共产主义煽动而听取美国意见改变态度。南大创办人陈六使，一开始便申明南大师生不参与政治，以消除外界的疑虑。南大学生会重要领导人，在筹办阶段也很有意识地要摆脱中学时代学生组织的一些旧印记，积极塑造大学团体应有的理性和成熟形象。但是，处在纷纷扰扰的历史情境里，南大和南大学生会始终无法摆脱外力的干扰，树立独立自主的形象。随着新加坡政治局势复杂化，华文教育一再受挫，南大学生会很快就卷入教育与政治的纠葛中，从“文斗”走向“武斗”，并掀起一波波的学潮。这过程中，因为意识形态、种族情感和政治斗争的介入，使它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受到质疑。

本书甚为突出的一个重要论点便是肯定南大学生会的主体性与自主性。丘淑玲不赞同这么一种说法，即学生会深受左派或外来势力的影响和支配，有意进行颠覆活动。她认为判断学生的行为，不能只看外来影响，还要视察其内在动力，而要厘清这一点，必须正视华校生传统上对民族文化教育的感情和忧患意识。她没有否定左派思想对学生的影响，认为在大时代的笼罩下，青年学生回应或追随时代思潮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现象，但不应为此而否定他们的自主性。她的研究显示：学生会从筹备到成立的阶段，已流露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建立了优秀的领导班子，展示了坚定的理念和稳健的作风。踏入南大改革阶段，《白里斯葛报告书》（1959年）公布之前，学生会已经对大学的设备和制度等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公布之后，学生会反应相当理性，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认为报告书虽批评过苛但也有不少值得参考的建议。

随着周遭局势的改变，南大发展面临困境，学生会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它选择捍卫南大，拒绝向政府的压力妥协，陷入与政府对立的局面。从此，学生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主体性越发受到

猜疑。政府指责学生会听从左派指使，通过言论和活动协助宣传共产思想。学生会则坚持否认受外来势力支配，申辩维护华文教育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并对本身的主体性被否定感到愤怒。它遭受越强的压制，就作出越大的反弹，领导人原本主张摆脱中学时代的抗争模式，但最终又选择了与政府对抗。学潮时期的学生会，比过去激进，而且还卷入了政治漩涡中。即便如此，学生内心深层的推动力或坚持的原则没有改变，民族教育的忧患意识始终是一股支撑力量。在这对立和对抗过程中，外界势力更有可能渗透，有些想从中捞取政治资本；而学生会也可能借重外来支援，增强本身的力量。在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学生会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变得模糊了，但这不能断定它已不复存在。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一代学生的理想与热忱，不应被一笔抹杀。

南大学生会在激流中勇进，前后坚持了八年。从新马学生运动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有超越性。大学团体的身份、完整的组织、优秀的领导、出色的刊物和沸沸扬扬的学潮，使它攀临顶峰，缔造华校学生运动的高潮，展现了一个时代大学生对理想的追求、对真理的热爱，以及互助、爱校、爱国的精神。另一方面，它也有局限性和脆弱性。处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里，它根本无法摆脱外界势力的纠缠，而单薄的力量更难以跟大势抗衡。学生会在发挥了最大的潜能之后即告别了这个时代，往后天时地利人和不再，像它那样特殊的组织与活动也就难以再现。60年代中期南大学潮结束后，新加坡华校学生运动也跟着沉寂下来。因此，南大学潮可说是华校学运的延续，也是其终结。八年浮沉，这是一个时代转变的标志，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本书的贡献之一是有系统地整理和建构了这个阶段南大学生会的组织和活动的状貌，并追溯了华校生文化思路的演变，为他们的历史角色作了记录和评价。这项研究，从新马学生组织和学生运动

的发展历史来看，有其特殊意义；从第三世界学生组织和学生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则具典型意义。本书的另一价值是为南大历史研究提供一个重要视角，它从学生的角度切入，协助南大历史的建构工作。学生会将学生组织起来，参与南大的建设，协助大学的发展；但学生会卷入政治，与政府对立，也影响了大学的走向。因此，丘淑玲的研究，为新加坡独立前的南大历史，补缀重要片断。

历史的建构需要大量的一手资料。丘淑玲在研究这个课题时，引用了很多原始资料，这包括官方文件、报告书、出版物，学生刊物、各方声明、文告、备忘录、书信、请愿书，南洋大学会议记录、常年报告，还有口述资料，受访者有学生会主席、秘书、执委、部门主任等。这些资料增强了本书的学术价值。但就像南大史其他课题的研究者，丘淑玲一方面面对官方档案未能完全开放或原已开放却不准翻阅的困境，一方面又遇到一些与学生会关系密切的南大人不愿受访或受访时不愿涉及某些敏感问题的窘状。这些困难使她无法掌握某些事件的全貌，也未能肯定某些论据和论点的准确性。遇到这种情形，她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让部分史料说话，进行合理的讨论，等待往后的补充或印证。

丘淑玲是个非常年青的学者，希望这本书的研究经验和心得，为她的学术道路奠下良好的基础，并在此一基础上继续耕耘。今后，她可以扩大南大学生会的研究，或跟第三世界的大学学生会的组织和运动结合起来，或跟新马同样课题连串在一起；她也可以从学生会转移到其他层面，继续钻研南大历史。

2005年8月

谢 启

本书原是我的硕士论文，它得以写成及付梓，我得感谢很多人。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元瑾副教授。若不是她开拓南大史研究计划，我也就没有机会翻开这尘封的历史。李老师多年来的悉心教诲，让我获益匪浅。本书出版，还蒙老师惠赐序文，此恩此情，将永铭于心。

我也想藉此机会感谢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顾问周清海教授、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何启良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坚立博士、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兼副教授柯思仁博士和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游俊豪博士的指教和提点，还要谢谢在百忙中抽空替我写推荐书的林水椽老师和张丽珍老师，以及经常给我鼓励和关照的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所有老师和职员。

本书在写作期间，一度面对资料的问题，承蒙庄伟天先生不吝相助，著作材料才能更为丰富，在此要特别向他致谢。除此之外，我也要感谢所有曾接受我正式或非正式访问的南大校友，他们是：杨贵谊先生、胡铁鹏先生、吴诸庆先生、李业霖先生、王发祥先生、林焕文先生、叶迎章先生、王如明先生、王如英先生、许启针先生、郑东生先生、许万忠先生、黄宏荫先生、许嘉瑞先生、谢定金先生、廖裕芳先生、陈国相先生、谢声远先生、叶胜光先生、黄汉才先生和柯孙科先生。一些不方便透露姓名但也曾给我提供有关南大资料的校友，在此我也一并致谢。他们的宝贵经历和意见，对我理解南大和勾勒学生会的面貌助益良多，但书中观点由笔者负责。

另外我还要感谢同学利亮时、周兆呈、李慧玲、学长王建禄以及徐威雄给我的批评和意见，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其他在我撰写及修改本书期间，给予我各种协助和关怀的朋友们，特别是伍燕翎、杜玲玲、禰素薇、林青青、王一敏、杨莹、孙玲玲、梁淑玲、王淑娟、曹长荣、叶慧雯、陈乐、许元豪、林婉琪及钟必凌，真的谢谢你们。最后，我想向最爱的家人致以深切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谅解，求学的道路不会走的那么愉快和踏实。

丘淑玲

新加坡·云南园

2005年6月